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库

贸易政策 和市场结构

[以]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

[美] 保罗·R. 克鲁格曼 著

李增刚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库

贸易政策 和市场结构

[以]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

[美] 保罗·R. 克鲁格曼 著

李增刚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以)赫尔普曼,(美)克鲁格曼著;李增刚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库)

ISBN 978-7-5432-2382-0

I. ①贸… II. ①赫… ②克… ③李… III. ①国际贸易政策-研究 IV. ①F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5534 号

责任编辑 王韵霏

装帧设计 王晓阳

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

[以]埃尔赫南·赫尔普曼 [美]保罗·R. 克鲁格曼 著
李增刚 译

<p>出版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p> <p>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p> <p>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p>	<p>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3 插页 3 字数 168,000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p>
---	--

ISBN 978-7-5432-2382-0/F·743

定价:38.00元



主编的话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学通用教材。

20 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 200 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

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厉新

2014年1月1日



译者序

国际贸易新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克鲁格曼主要理论述评

200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表彰其“在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的分析”。^①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告中称:“贸易模式和区位是经济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什么影响?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保罗·克鲁格曼构建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新理论,并因而将国际贸易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双层博弈框架下的贸易政策选择理论研究”(项目号:06JC790025)系列成果之一。本书作者之一克鲁格曼是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此这里详细介绍其学术贡献。克鲁格曼、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赫尔普曼以及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被合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三个“人”(Krugman, Helpman和Grossman,三个人姓名的后缀都是“man”)。赫尔普曼的主要学术贡献在我为他与格罗斯曼合著的《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中译本写的“译者序言”中已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阐述。参见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和经济地理这两个此前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结合在了一起。”^② 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等，特别是他创建了以规模经济、有差异产品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对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提出了挑战；以国际贸易新理论为基础，克鲁格曼还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同时，克鲁格曼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的时候考虑了运输费用的问题，放松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运输成本为零的假定，并由此提出了经济地理学的问题，即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这样，克鲁格曼以规模经济和有差异产品为出发点，将国际贸易模式的分析和经济活动的区位分析结合了起来。由于克鲁格曼这些方面的突出成就，他曾经获得了1991年的克拉克奖。那时，就有人认为，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迟早的事情。

克鲁格曼曾经因为成功地预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等而备受人们关注。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克鲁格曼更是对小布什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进行了广泛抨击，认为布什政府减税、增加公共开支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将使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有学者在评价克鲁格曼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指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鲁格曼，与美国在该年发生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有一定关系，虽然瑞典科学院发布的公告中并未突出克鲁格曼在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预言方面的突出表现。应该说，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是因为其在国际贸易新理论和经济地理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

克鲁格曼著述颇丰，其著作和论文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从1979年至今，他已经在国际顶尖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8篇、《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3篇、《经济学季刊》发表论文5篇等^③，出版了专著和教科书20余部。他与奥伯斯菲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从1988年第一版问世，到2008年已经连续出版了8版。他还出版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等教

科书。另外,克鲁格曼从1999年开始就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针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等进行评论,通过浅显易懂、生动有趣的文字向公众传播经济学理念。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他为“他那个时代最具创造性的经济学家”^④;美国民主党老资格人士詹姆斯·卡维尔则说:“假如我拥有保罗·克鲁格曼十分之一的头脑和二十分之一的勇气,那我将成为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克鲁格曼早在1982—1983年他30岁的时候就作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之一撰写了《1983年总统经济报告》(*The 1983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的大部分内容。这足以看出克鲁格曼在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和现实运用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解释国际贸易为什么发生的理论主要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强调国家之间贸易发生的根源在于各国在不同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只要两个国家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就应该进行贸易,专门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强调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各国家要生产以本国丰裕要素为密集要素的产品,而进口以本国稀缺要素为密集要素的产品,这是国际贸易发生的根源。然而,20世纪40年代,针对要素禀赋论进行的实证研究(即“里昂惕夫之谜”)并未证实该理论。

许多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研究的努力。^⑤到20世纪60年代,更多的学者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巴拉萨(Balassa, 1966)、格鲁贝尔和劳埃德(Grubel and Lloyd, 1975)证明了相同产品的

大规模产业内贸易的情况；同时，巴拉萨(Balassa, 1967)和克拉维斯(Kravis, 1971)提出不考虑规模经济 and 不完全竞争就不能够解释战后的贸易增长；梅尔文和沃纳(Melvin and Warne, 1973)将垄断部门放入传统的贸易一般均衡模型中探索贸易得益的问题。但是，对“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应用的研究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取得成功的。^⑥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发表《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产生内生的比较优势。克鲁格曼正是看到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解释贸易现象的潜力，因而将其应用于国际贸易分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用这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比较利益较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大大低于相互类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Krugman, 1979a)。正是这一篇文章，奠定了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开创者的地位。克鲁格曼在随后的文章(Krugman, 1980, 1981, 1983)中，深入探讨了国际贸易，特别是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成为贸易发生的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理论的结合得到充分发展，许多学者加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中，发表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与克鲁格曼在1985年共同发表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⑦可以看作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在这本著作中，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试图将不同的特殊理论模型结合起来，提炼出共同的因素，整合成一致的理论。正如两位作者指出的，这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综合的方法，来分析一个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的世界中的贸易。……我们发展了一个新的贸易理论的分析方法，它使我们能够将现存的一些模型作为特例来处理，同时还可以处理其他一些问题”。^⑧他们试图解决的是国际贸易理

论的两个传统问题：国际贸易为什么发生？国际贸易对贸易国有利吗？他们的结论表明，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即使两个国家不存在要素禀赋的差异，国际贸易也能够发生。两位学者也表明，这并不是对要素禀赋论的否定，而是找到了解释国际贸易原因的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说，要素禀赋差异并非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国际贸易增加的潜在收益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本身的生产效应，由于存在报酬递增，生产规模的扩大自然能够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2)生产集中，即在某些情况下，生产相同产品的产业会集中到一个国家，这样生产规模将会大大扩大，使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产生规模经济收益；(3)合理化，由于不完全竞争，贸易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性，这会减少公司数目，成为导致贸易得益增加的一种力量；(4)多样性，即贸易将比任何一个国家提供更多种类的产品。因此，在一个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的世界里，贸易仍是有益的。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被称为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书房里都需要的里程碑式的书”。^⑨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在对国际贸易发生原因重新思考的基础上，由克鲁格曼、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巴巴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等人提出并发展的。^⑩其理论基础就是国际贸易新理论对“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的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假定，由于规模经济及其所造成的较高的行业进入障碍，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性厂商的数目相对较少，即形成所谓的寡头垄断或在现实中比较典型的双寡头垄断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竞争非常激烈。假定有两个国家、两个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一个企业要想将另一个企业排挤出市场，就要通过提高产量或扩大生产规模给对方造成可信性威胁。但是，任何一个企业的

行为都将可能引起另一个企业相同行为的报复,从而这些扩大生产规模或提高产量的威胁并不可信。此时,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要对本国企业在该产品的生产、销售上进行补贴,那么受到补贴的企业不论对方采取什么行动,扩大生产都将是理性选择,这种威胁就成为可信的。没有得到补贴的企业退出竞争也就成为理性选择。^⑪所谓“战略”,其含义是指:在寡头垄断模型中,政策的制定者需要在考虑外国企业或政府的反应行动的基础上制定出自己的最佳行动纲领。^⑫

克鲁格曼在运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分析国际贸易发生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在寡头行业中,本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的重要性。他在《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⑬一文中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模型。他假定:(1)市场由两个寡头垄断厂商分割,一个本国厂商和一个外国厂商。各寡头厂商能够决定市场价格,并且能够在不同市场上索要不同价格,他们通过相互倾销实现向对方市场的渗透,并在第三国市场上展开竞争。(2)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边际成本曲线向下倾斜。在这两个假定下,一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封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企业在特定市场上的特权地位,受到保护的企业的销售额会增加,其边际成本将随着生产扩大而递减,而外国企业的销售会减少,其边际成本将随着生产缩小而递增。换言之,该国的进口保护措施为本国企业提供了超过其国外竞争者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将转化为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市场份额。结果是,贸易保护增强了本国厂商在对方国家及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削弱了外国厂商在本国市场和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是由于政府保护产生的这种相互强化的作用机制,政府通过保护可以为本国企业带来不断递增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在动态规模经济中,进口保护也能够起到促进出口的作用。克鲁格曼在这篇文章中,仅以一个产业进行分析,没有考虑进口保护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在《美国对外国目标产业政策的反应和美国经济》(Krugman, 1984a)中,他对此进行了分析。他假设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政府可对每个产业加以保

护,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并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为止,然后再保护下一个需要保护的产业。这些模型虽然证实了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会促进出口的观点,但对整个社会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当某个厂商或行业扩张时,势必引入别处的资源,从而导致其他厂商或行业的收缩,而这些收缩的厂商或行业有些可能有很好的出口前景。所以,从整个经济来看,进口保护未必能够促进出口。

就像《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一样,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在《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中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⑭他们在这本书中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政策出发,首先分析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下的本国市场力,然后分析了战略性出口政策和战略性进口政策。他们的研究得出了关于贸易政策的五个悖论性的命题:(1)关税或进口配额可能会降低保护产业的产量;(2)进口补贴可能会改善贸易条件;(3)出口补贴可能会大大提高受补贴企业的利润,并且企业的利润增加可能会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4)保护可能提高外国企业的利润,就像提高本国企业利润一样;(5)关税可能降低国内价格。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指出,这些“悖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的反应不同于完全竞争的情况。正是这些悖论,成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在评价该书时指出,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想当然地看作是对其研究主题未来学术讨论的共同背景”。^⑮还有学者在评价该书时指出,这本书“是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政策基本观念的完美总结。不仅提供了这个研究领域正在发生什么的有益指南,而且以用丰富洞见武装读者的方式组织各种不同的模型”。^⑯

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克鲁格曼(Krugman, 1987)还运用一个假想的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的例子进行了说明。欧洲国家对空中客车支付了少量补贴,但却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波音公司却失去了整个市场份额。假定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都能够生产某种有150个座位的飞机,产品销往第三个国家。如果两个公司都生产,则每个公司将亏损5亿美

元；如果只有一个公司生产，另一个公司退出，则生产者将获利 100 亿美元，而退出的公司既没有收益，也没有亏损。此时，两个公司的支付矩阵如表 1 所示。

表 1 波音和空中客车的支付矩阵

	波音	生产	退出
空中客车	生产	(-5, -5)	(100, 0)
退出		(0, 100)	(0, 0)

在这种情况下，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博弈的均衡结果并不唯一，它们都有可能进行生产。如果波音公司已经开始生产，空中客车将不再进入，因为空中客车进入将导致两个公司都亏损。假定欧洲国家意识到占领该型号飞机的巨大市场利润，对其补贴 10 亿美元，那么两个公司的支付矩阵将变为表 2 所示。

表 2 欧洲补贴时波音和空中客车的支付矩阵

	波音	生产	退出
空中客车	生产	(-5, -5)	(110, 0)
退出		(0, 100)	(0, 0)

在欧洲国家对空中客车补贴时，无论波音公司是否生产，空中客车只要生产就能够获得正利润，其最优策略必然是生产。如果美国不对波音公司进行补贴，那么它必然退出该市场。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欧洲国家只付出了很少的补贴(10 亿美元)，就为空中客车带来了 100 亿美元的利润，而这些利润本来是属于波音公司的。在这个例子中，欧洲国家采取补贴政策，使空中客车对波音公司形成可置信威胁，即无论波音公司是否进行生产，空中客车公司肯定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波音公司得不到美国政府的补贴，其最优策略自然是退出竞争。这个例子表明，欧洲国家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通过给空中客车很少的补贴，就获得

了很大的收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然表明了贸易保护政策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有积极作用,但是,克鲁格曼(Krugman and Smith, 1994)也指出,几乎所有从事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学者都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政府制定贸易保护政策的理由,他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仅仅是一个研究纲领。

三、规模经济与新经济地理学

克鲁格曼在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理论时,还考虑了运输费用的问题。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没有运输费用,那么贸易和要素流动对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是相同的。然而,运输费用在贸易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是运输费用的存在,加上生产的规模经济,关税不仅不会使得本国产品的价格上升,反而会使本国产品价格下降。这是因为关税会提高本国产品的产量,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单位产品的价格下降,而下降的幅度可能超过了关税和运输费用之和。这样,在规模经济和运输费用存在的条件下,关税就可能成为促进本国产量提高的一个手段,虽然关税的存在并没有使得本国产品的价格上升。这就为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新理论之后创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是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发布的详细公告称^①,经济地理学最近的发展主要基于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克鲁格曼在1991年提出来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该模型假定,存在两个基本条件完全相同(具有相同的偏好和生产函数)的地区,产品可以从一个地区出口到另一个地区。这两个地区分别具有两个生产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农业产品的交易没有成本,而工业

品的交易受到固定运输成本的限制。并且,存在两类不同的个人:工人,他们可以自由地移民到提供较高工资的地区;农民,他们不可以自由移民。所分析的问题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如何在两个地区之间分布?是否存在工业在一个地区的集中?人口是否会被划分成为工业“中心”和农业“外围”?

克鲁格曼认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有选择在具有规模经济和规模较大地区居住的激励。企业选择在具有较大市场的地区进行生产活动,为的是利用较大市场产生的规模经济,并节约运输费用;个人选择居住在较大的地区,是因为这些地区能够提供较高水平的工资和更多样化的产品。企业和个人的这种倾向会增大市场之间的规模差异和强化企业与个人在较大市场区域选址和工作的可能性。两个地区的初始条件可能完全相同,无论是在市场规模,还是人口结构,此时两个市场达到了均衡。然而,这种均衡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被打破,就会彻底改变两个地区的区位优势。比如,发生了其中一个地区的人口向另一个地区的迁移,即使规模很小,也会改变两个地区之间的平衡。如果移入地区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了市场,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就会引起更多工人移民到另一个地区,而这种移民会产生累积循环效应,移民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两个地区的差异会越来越大,从而移入地区就会形成工业集中和聚集,从而成为“中心”地区,而移出地区由于工业人口的减少,而成为农业“外围”地区。这表明,一个地区微弱的规模经济优势,就可能使两个地区的地位发生巨大变化。

克鲁格曼还分析了另外一种情况,假如大部分企业都位于一个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只有一家企业位于一个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该企业可能会成为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垄断者。它需要向农民和本企业的工人出售产品。然而,企业由于位于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而不具有规模经济,同时由于工人不能够生活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而要求得到较高的工资,因为他们需要为从市场规模较大地区进口的产品支付运输费用,然而只要该企业的垄断地位足够高,该企业在这个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

生产仍然是有利可图的。这实际上表明,该企业在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生存依赖于垄断程度、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的偏好。不过,由于“中心”地区的发展,土地价格的提高,可能会促使产业的分散而不是集中。另外,运输成本下降、规模经济技术的日益盛行,可能也会促使产业分散,而不是过分集中。

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建立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引起了对区位问题经济分析的热潮,并在经济地理学和主流经济学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的桥梁。这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研究的。^⑩一条思路是将企业之间投入产出关联的重要性作为企业集中趋势的替代性解释。其基本的思想是,一家新企业进入某一地区会扩大上游供应商的市场,从而上游供应商会以较低的价格进行生产;由于提高的规模经济,下游生产者的成本也会下降。但是,如果劳动力的流动性很小,劳动力的供给没有弹性,那么生产集中必定会引起工资上升。这就会产生具有相反方向的两种力量:更高的国内工资水平会导致需求上升,同时会降低企业的利润,从而使得企业向外围地区的选址更具吸引力(Krugman and Venables, 1995)。另一条思路是在新经济地理学与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传统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们(Fujita and Krugman, 1995; 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 1999; Fujita, Krugman and Mori, 1999)试图回答城市将在什么地方、何时出现的问题,强调了农业部门的土地需求如何与工业部门的规模经济相互作用的问题。

四、克鲁格曼的其他经济理论

克鲁格曼除了在国际贸易新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外,还在国际金融、汇率决定特别是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预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1. “三难困境”

克鲁格曼在1979年发表的《国际收支危机理论》一文中，提出了固定汇率、资本流动和收支平衡这三个目标在长期内能否同时实现的问题。克鲁格曼的分析表明，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这三个目标中最多只能实现两个，这被称为“三难困境”。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要保持汇率稳定，就必须放弃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比如，一国在存在大量失业时，增加货币发行可以刺激经济。增发货币发行会使本国利率水平下降，本国资本为了寻求更高的收益率，可能会流向其他国家，国内投资减少，货币政策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破坏了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果该国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防止资本外流，就必须采用浮动汇率制，在增发本国货币，降低本国利率的同时，提高本币的汇率。这一“三难困境”就使得每个经济体只能在下述三种汇率体制中选择一种。(1)浮动汇率制。它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并且不要求决策者必须采取诸如提高利率的措施去捍卫汇率，从而使政府能够运用货币政策去实现其经济目标。然而，它却不可避免地要在币值波动方面付出代价。(2)固定汇率制。它在维持币值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此时的利率必须成为维持汇率稳定的主要工具。(3)资本管制。它相对地调和了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但是却不得不在资本自由流动方面有所放弃，并承担由此而来的其他一切代价。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要想维持货币政策独立，就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而要维持固定汇率制，就不得不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三难困境”的分析预示了金融危机发生的不可避免性。

2. 汇率目标区理论

克鲁格曼在1991年发表了题为《目标区与汇率动态》的论文，提出了汇率目标区理论，分析了在目标区管理体制下汇率与基本经济变量的动态关系。克鲁格曼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是，汇率与其他资产价格一样，